

“古文运动”与“唐宋八大家”

— 序 言

在中国汉语文学史上，有两次著名的“古文运动”。一次在中唐，以韩愈、柳宗元为首领；一次在北宋，以欧阳修为主盟。韩柳之后，李翱、皇甫湜等人，写作成绩，不能和韩、柳相颉颃；欧阳之后，曾巩、王安石、苏洵、轼、辙父子，写作成绩虽亦有广狭高下之分，然尚足为欧阳之羽翼。到了明代，便以两代八人并称，号为“唐宋八大家”。最早把他们的文章合为一集的为朱右，但那个本子早已佚失，其后便有茅坤的《唐宋八大家集》，至今流传不绝。八家的次序，朱氏是：韩、柳、欧、曾、王、苏，茅氏则变为：韩、柳、欧、苏、曾、王。以后便成了习惯的提法。经过清代“桐城派”的称扬，“八家”的影响，便从通都大邑，深入到穷乡僻壤，成为一切开笔作文者的典范。直到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后，才逐渐失去其光彩。

所谓“古文运动”，实质上是以复古为旗帜的散文改革运动。散文为什么要改革呢？原因是散文是以记录语言为职志的，语言不断变化，相应的散文也不得不进行变革。比如商周时代的《尚书》，其中不少文章象所谓“周诰”“殷盘”，后人读起来很难懂，韩愈称之为“诘屈聱牙”，因为它记录语言时，虚字，即语气词很少，当时人能懂，后来的人就懂不了。到了春秋战国

时期，在社会大动乱、大变革的急迫需要下，便创造了有大量之、乎、者、也、已、焉、哉等一系列语气词的散文，在记录语言上作到了“无不达己意，无不喻己情”的地步，先秦诸子的文章就是代表。这是散文的一次大跃进、大变革。

但这时又出现了“雅言”和“俗语”、“方言”的矛盾。以《论语》为首的诸子，基本上属于“雅言”系统，而“雅言”的性质相等于今天所谓“普通话”。这是吸收各地“方言”中最共通的成分而形成的一种文体，既适用于一个地区，也适用于九州各国。这就叫作“文言”，不合这个标准的，就会因“言之不文”而“行而不远”（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）。但它和口头的“方言”、“俗语”却有了一定距离。口头语言变化很快，这种矛盾，也越来越大。秦始皇统一六国，也统一了文字——“书同文”。于是，一字多音、一音多字、一字多义、一义多字的现象，成了汉语的特色，也为散文提供了丰富的词汇。这就是文言散文的传统。这一传统持续了两千多年，为华夏民族的团结，国家的统一和文化的繁荣发展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由于散文终究是以记录语言为职志的，而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要求，不断变化着，要充分用文字表现出来，就需不断地吸收口语中生动活泼的成分，来提高它的表现力。历史上的散文家，在这方面作得越好的，他的成就就越大。而司马迁正是做得最好的伟大典范之一。从班固起，开始有远离口语的倾向，经魏晋到六朝，就出现了畸形的形式主义的发展，形成了所谓“骈文”。在当时的士族门阀统治下，文化只掌握在少数上层分子手里，于是他们的文章脱离现实，脱离社会，脱离人民生活，内容空虚，而只追求字句对偶的美，辞藻华丽的美，用典巧妙的美，音调谐和的美，使文章成为统治阶级的装饰品、玩赏品，全不切实用。尽管其间

个别作者，象鲍照、庾信等人也写有题材严肃、感情真挚的作品。但因文体的限制终难为广大群众所接受。所以从总的趋势来看六朝骈文，代表着散文发展史上极端衰敝的文风。

到了唐代，时代完全不同了，而骈俪之风却仍长期占着统治地位。以太宗李世民的英武，文治武功都取得了巨大成功，但对文学，却只拿来作为粉饰太平的工具，自己也附庸风雅，追步齐梁。故齐梁余风，风靡一世，而且延续达百年之久。但由于这种文体难于为现实服务，所以早在六朝骈俪盛行的同时，要求改革的呼声，已不断出现。北周苏绰，曾作《大诰》以立散文的标准；隋文帝杨坚下诏：“公私文翰，并宜实录”，隋臣李谔也上书请革文弊。初唐“四杰”，为骈文高手，却也有改革要求，至陈子昂遂高举起反齐梁的旗帜。盛唐以来，萧颖士、李华，在创作实践上都能突破六朝藩篱，各自成为名家；而元结、独孤及、梁肃、柳冕等人，从理论到实践为“古文运动”奠定了丰厚的基础，韩、柳继起，遂使这一次散文改革运动达到高潮。《四库提要》对此作了总结性评论，说：“考唐自贞观以后，文士皆沿六朝之体，经开元、天宝，诗歌大变，而文格犹袭旧规。元结与独孤及，始奋起湔除，肖颖士、李华左右之，其后韩愈继起，唐之古文，遂蔚然极盛”。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。

唐代以“古文”为旗帜的散文改革运动，是散文发展史上对骈俪歧途的拨乱反正。而这个拨乱反正，又和当时的儒学复古潮流紧密联系着，也和时代的需求分不开。盛唐是唐王朝盛极而衰的关键时期，以安史之乱为转折点。从这次大乱后，适于粉饰太平的骈体文，越来越不需要了，需要的是能为政治、经济改革服务的，切于实用的文体；加以当时社会最大的祸害之一，是道佛，特别是佛教地主的横行，因之尊儒反佛和提倡古文合而为一。

提倡古文的人，大都是儒教崇拜者和佛教反对者。由于当时出身于中小地主的封建士大夫，要忠君、爱民、忧国，没有别的法宝，只有传统的儒学。他们在反佛上可能有差别，而在崇儒上则毫无例外，他们把“中兴”“救世”的愿望，都寄托在儒学复兴上，而以新体散文为之鼓吹。苏轼称颂韩愈“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济天下之溺”。（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）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，不管韩愈是否真能达到如此其高的地位。

在韩、柳的当时，古文虽在文坛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，也出现了除韩门李翱、皇甫湜等人以外还有白居易、元稹、吕温、刘禹锡等大批作者，但随着晚唐政治的腐朽黑暗、濒临崩溃的形势，坚持古文以批判现实的作家象皮日休、陆龟蒙一类人越来越少。而由宦海浮沉转上醉生梦死、荒淫堕落的人文人则日见其多。于是适于自欺欺人、以浮华掩真实的骈文，又一度盛行起来。杜牧、李商隐、温庭筠，就代表着这一转变。李商隐曾在他的《樊南甲集序》中说他十六七岁时，就能以古文露头角，后来在藩镇幕府任职，又两次作秘书省郎中官，才改作“今体”，专学任（昉）、范（云）、徐（陵）、庾（信），终于成了骈文专家。经过五代十国的分裂变乱，直到北宋，文章的工巧靡丽超过了六朝，而以李商隐为不祧之祖。赵氏王朝，建立了空前的君主专政，而官僚们更可以在高度的物质享受下，优游俯仰其间。杨亿、刘筠为首的达官集团，在诗歌方面有《西昆酬唱集》为靡丽诗风的代表，而其文也与之相辅，被称为“西昆体”。他们“务以言语声偶摘裂，号为时文”（欧阳修《苏氏文集序》），“句读妍巧，对偶的当”，“事实繁多，声律谐调”（石介《上赵先生书》）“穷妍极态”、“淫巧侈丽，浮华纂组”（石介《怪说》），“专事藻饰，破碎大雅，反谓古道不适于用，废而弗

学”（范仲淹《尹师鲁河南集序》）。这种文章的特点，形式上比六朝更整齐，所谓“骈四俪六”，基本上全是四、六句；内容上不只是空，而且是伪。文章至此，完全走上死路。而政治局势内忧外患，促使朝野人士，产生了维护政权和进行改革的迫切愿望。以此为契机便出现了第二次“古文运动”。这一运动，以柳开、穆修、石介为前驱，从理论上给予时文以沉重打击，为古文开拓道路，而王禹偁则在写作实践上作出了成绩。韩愈当年在尊儒反佛写古文的过程中，曾提出所谓“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、孟轲之道”的“道统”理论，而在宋代的古文运动中，则既强调“道统”又强调“文统”，两“统”都以韩愈为崇拜偶像。到了欧阳修借两次“知贡举”的机会，用政治力量，严禁考生写作骈文而大力提倡古文。三苏、曾、王都是在他提拔影响下成为一代作家的。欧阳修便是当时公认的韩愈“道统”“文统”的继承者。加上他的政治地位（曾任枢密副使，参知政事——即副统帅、副首相），影响也特别大。苏轼曾说：“愈（韩愈）后三百年而得欧阳子，其学推韩愈、孟子以达于孔氏”（《居士集序》）。而《神宗旧史·本传》中说：“至修文一出，天下皆向慕为之唯恐不及，一时文章大变”（《欧阳文忠公集·附录》）。所以宋代的“古文运动”，是唐代“古文运动”的直接继承者，是较之唐代更容易地取得成功的。

这两次“古文”即散文改革运动的代表人物们的贡献，主要在新散文的创作上，但所标榜的却都是“文以明道”。“道”是第一位，而“文”是第二位的。他们都尊儒，而宋人提得更响亮；他们都提到“道统”，而宋人提得更普遍更明确，而且加上了“文统”。他们具体主张当然也有差别。比如同一“道”，韩愈、欧阳修等所指都是“文武、周公、孔子之道”，而柳宗元、三

苏，则强调的是“理道”（治世之道）和“有补于国”的道；同一尊儒也，韩愈、石介等力排佛老，而柳宗元、苏轼等，却不排佛老。但总的看来，他们多半并不是哲学家或思想家，而重要的是散文家，是在整个散文发展史上，起有革新和创造的作用的，他们的文集，是我们宝贵的文学遗产。

韩愈、柳宗元不仅时代上居“八家”之首，更重要的是他俩的散文创作，足以领袖群伦。前人对韩愈的文章，很重视他的理论文。其实韩的理论文，不在于说理说得怎么高明，而在于他具有一种蓬勃的气势。这种蓬勃的气势，源于炽热的感情；炽热的感情，源于现实的激发和典籍的陶冶。他的《原道》、《原性》、《原毁》、《论佛骨表》，固然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，也表达了作者分明的爱憎，但与其说是说理精深，倒不如说是“攻势凌厉”。他的抒情性论文，象《伯夷颂》、《获麟解》、《杂说》一、四之类，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他的论点，都不能不受它的感染而为其所激动。弱于理、强于气，很有点近于《孟子》。只有《师说》、《争臣论》等篇，词明理举，堪称论文的佳作。

韩愈散文中成绩最大的，应该是他的传记文，包括大量的墓志在内。这里除过违心的谀墓之词外，可以说是十分丰富多采的。传记中象《张中丞传·后序》，名为“后序”，实是补李翰《张巡传》之不足，而补写的一篇传记。序中塑造了张巡、许远、南霁云等三个英雄人物，朴素而生动，非常感人。墓志中他对不同人物的不同事迹、不同性格和不同思想感情，通过集中、突出、剪裁、渲染，而出之以寓于感情的笔调，使所写人物，充满活力。象给他的朋友柳宗元、孟郊、樊宗师等所写的墓志，都是如此。至如《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》写“天下奇男子”王适，《故幽州节度判官赠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》写骂叛徒被杀的张

彻，用朴素的描写来刻画人物，尤具特色。

韩愈的赠序，是一个创造。他的大量的赠序文，都是抒情文的上品。长篇象《送李愿归盘谷序》短篇象《送董邵南序》或故作旷远，或强作劝勉，而郁勃之气，溢于言表。其他如《祭十二郎文》且泣且诉，《进学解》之寓愤于谐，《画记》之把繁杂的人物器用，写得了如指掌，都是很高的艺术品。韩愈的文章，有“怪怪奇奇”的一面，那是新的形式主义，影响不好；而“文从字顺”的一面，则不但“务去陈言”而且不断吸收新的语言加以提炼，再加上字法、句法和结构的讲求，使散文发展更具有有一种光彩。

柳宗元的文章，最大的特色不是感情而是理智。他青少年时期就博极群书，而且善于把书本和现实相印记。他曾说：“信书成自误，经事始知非”（《三赠刘员外》）。因之他的全部作品处处闪耀着理智的光芒。他的理论文代表作《封建论》是周秦以来历史的总结。条分缕析，反复论证，以理服人而非以情动人；《桐叶封弟辩》、《断刑论》以及《非国语》之属，莫不如此。单就文学方面来看，他的最大创造，是寓言和辞赋。象《三戒》、《蝥螋传》、《罍说》等，都是因物肖形，极喜笑怒骂、幽默讽刺之能事。辞赋中除直接抒情以外，也多以寓言之。象《骂尸虫文》、《宥蝮蛇文》、《憎王孙文》等，都是借物刺人，十分深刻，为古今文家所少有。以《永州八记》为代表的游记文，是柳宗元的另一创造。这些游记，不仅体现了他对自然风光观察体味的深刻细致，而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身世情感溶化于自然景物之中，使山水也具有了他的思想性格。至于他的传记文象《段太尉逸事状》；赠序象《送薛存义之任序》都不只是文章好，而重要的是陈义高。他写段秀实关心人民疾苦，沉着、勇敢地 and 权势强暴者作斗争，至今读之，仍勃勃有生气。他向薛存义提出：官吏是人

民仆役的观点，更不是一般作者所能企及的。

北宋古文家，并尊韩、柳而侧重于韩。欧阳修又强调“韩李”（李翱），说明他们不仅反对了骈俪，也反对了由韩的“怪奇”而导致的险怪一路，而只走李翱所承继的韩的“文从字顺”。欧阳修致力最大的是传记文，他以《新唐书》和《新五代史》的主编和编著，列身于史学家之林，而作为文坛领袖，自然也以这方面成就更为突出。他写传记文的标准是：“事信言文”（《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》）。要“事信”，就要调查考证；要“言文”，就要斟酌于详略、剪裁。这在他的《论尹师鲁墓志》一文中，说得最清楚。“事信”需要客观，而“言文”又不能不带主观色采。他的史传和史论，大都具备着这两个特点。理论文他虽不见长，但《朋党论》、《纵囚论》等，却表现了他的真知灼见。文章丝毫没有剑拔弩张的气味，而只是反复论证，抑扬顿挫，从容不迫，以理服人。他的“序”（书序、赠序）、“记”（记亭、园、台、堂）多有名篇，在写作上则夹叙夹议，间以描写，往往有“一唱三叹”之妙。

苏洵、轼、辙父子兄弟齐名，而各有不同风貌。苏洵长于政论，高者可以与《战国策》中的名篇比美。《辨奸论》勇于干预现实，支持改革派，很有斗争精神；《六国论》借战国史实，总结经验教训，以反对宋王朝的对外屈辱政策，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。苏轼博学、多才、有识，结合着他一生所走的不平坦的道路，接触社会面相当宽阔，这就决定了他的思想的复杂性。他尊儒而喜释道，对事、对人、对物，他常有独立的深刻见解。他不固执，也不圆滑，随遇而安，无所不适。表现在文章中，是十分丰富、复杂、而又汪洋恣肆的。他有一部分理论文，好矜奇立异，抓一个特点作为一篇的中心，反复论证，以达到预期的结论，《留侯

论》可作代表。他把张良一生功业成就的关键，说成是在于“能忍”，在于“忍小忿而就大谋”，道理是不能令人信服的，但却不能不佩服他文章所具有的魅力。他的杂文、杂记，往往对事理观察入微，富于哲学气味，而又妙趣横生。象《日喻》，用瞎子不能靠别人的指点认识太阳，来说明“道可致而不可求”的道理，因为一切事物的规律，主要从不断的实践体验中得来，其精微之处，的确是不可言传的。这种道理《庄子》说得最透，而苏轼文中也写有不少这方面的体会。苏轼的前后两篇《赤壁赋》，是他的另一方面的名作。他用平易精炼的语言，写流连于江山风月之间的人物，怀古伤今，抒发对人生的感慨；终于把沉郁苦闷的心情，溶化于物我两忘的境界，达观而非消沉。写景写情，各极其妙，是散文赋的杰作，是有辞赋以来所未有的。苏辙与乃兄相形之下，当然要减色得多，但他的佳作，亦复能独自树立。他长于叙记文。《黄州快哉亭记》、《武昌九曲亭记》可为代表。《快哉亭记》极写山川形胜，联系对古人古事的怀念，从而抒发其政治失意而不以得失为怀的旷达心情。文章雄放而有风致。他的其它作品，大都委曲明畅，时有秀气。

曾巩的散文，《宋史》说他“为文章上下驰骤，愈出而愈工。本原六经，斟酌于司马迁、韩愈。一时为文者，鲜能过也。”

（《本传》）实际上他和欧阳修最为接近，也最为欧阳修所赏识。他的《墨池记》说王羲之的书法之所以好，在于“精力自致”，而不是“天成”，强调了“学”的作用。他的《越州赵公救灾记》，是一篇很好的“荒政”总结。写得委曲周至，事理明析。由于他以儒家正统自居，故文章也以“古雅”、“平正”为特点。他的有名的《战国策目录序》，把策士们的言论作为“邪说”而鼓吹“先王之道，因时适变，为法不同，而考之无疵，用

之无弊”，体现了强烈的儒家卫道士的观点，这是他所以不能有更大成就的原因。

王安石在历史上以变法著名，但在学术上却是儒法并用而以儒为主，只是在写作上吸收了法家精神而已。他特别注重文章的实用价值，他认为“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”，“要之以适用为本”，这和柳宗元的主张一致。一般说他的文章，精悍严密，逻辑性强，全没有淫词滥语，而说理明透。长篇论文如此，短篇也不乏脍炙人口的名作，象《答司马谏议书》就司马光的来书，一一辩驳，针锋相对，点滴不漏，使对方难于反对；而《读孟尝君传》更一扫千余年来人们对孟尝君“得士”的评介，提出相反的结论。不到一百字的短篇，却写得层次分明，转折有力，真是得未曾有。尽管这两篇文章的论点不无欠缺之处，但作者驱遣文字的工夫，却是很少见的。

由于唐宋两次“古文运动”，由于“八大家”的写作实践，使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散文，长期占据了散文发展史上的主流地位。由宋、金、元到明，一直统治着文坛。明代前后七子的“复古运动”，矛头指的是“时文”——“八股文”，有一定意义，但他们标举秦汉，排斥唐宋，没有创造出新文体；而唐顺己、归有光等人，重整旗鼓，直承“八家”，“八家”之称，也从此确定下来，但承袭多，发展少。宗唐宋与宗秦汉，乃“五十步”与“百步”之差，其作用不能和唐宋两次“古文运动”相比。到了清代，与“时文”对立，在各体骈、散文都在复兴的情势下，桐城派又一次掀起了一个古文高潮。他们总结了“八家”的写作特点，提出了所谓“古文义、法”，传授不绝。尽管他们讲的“义”、“法”，又造成了新的框框，成了散文写作的新桎梏，以至“五四”时代，被称为“桐城妖孽”！但“唐宋八家”的创作经验，

却仍然值得我们重视。概括起来，有以下几点：

一、它虽是脱离口语的文言，但不断以词汇的更新维持其与口语的联系，表现力较强；

二、字句、篇章，没有死硬的格式，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，自由抒写，桎梏较少；

三、虽形式自由，但仍有章法、篇法以至句法、字法可循，有腔有调，有节奏感，富于感染力。

当然这些东西，如果没有深厚充实的内容，就仍会成为可憎的滥调！作为优秀文学遗产的一部分，批判地吸收其精华，剔除其糟粕，借鉴其形式，是有益的，必要的，也是我们今天的责任。

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肃清“四害”流毒，实现拨乱反正，我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，但是诗词评介、鉴赏居多，而散文研究成果较少，这是一个缺陷。阎凤梧、陈霞村二位同志编选的这部“唐宋八大家”文，选篇颇丰，注译准确，文章题解时有新意，它对评介古代优秀散文的思想和艺术，引导青年学习探索，以便发扬光大、推陈出新，都将大有裨益，应当得到鼓励。

姚奠中

1984. 4. 15.

韩 愈

韩愈（768—825），字退之，孟州河阳（今河南孟县）人。韩氏郡望为昌黎（今河北昌黎县），自称昌黎韩愈，世称韩昌黎。唐德宗贞元八年（792）二十五岁中进士。贞元十八年任国子监四门博士，不顾世俗讥笑，抗颜而为人师，广收门徒，组织文学改革的生力军，被诬为狂人。贞元十九年任监察御史，关中天旱人饥，他上书请求减免徭役赋税，触怒权贵，被贬为阳山（今广东阳山县）令。唐宪宗元和十二年（817）任太子右庶子时，随宰相裴度平定淮西藩镇吴元济之乱，因功升为刑部侍郎。元和十四年，上书反对迎拜佛骨，慷慨陈词，触犯宪宗尊严，几乎被杀，幸得裴度、崔群等人援救，贬为潮州（今广东潮安县）刺史。唐穆宗长庆元年（821），由袁州（今江西宜春县）奉召回京，任国子祭酒，又转为兵部侍郎。其间韩愈曾出使镇州（今河北正定县），制止了王廷凑的叛乱，因功升为吏部侍郎，世称韩吏部。唐敬宗宝历元年死于长安，终年五十七岁。

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杰出的散文家、诗人。在政治上，他一贯反对藩镇割据，维护唐王朝中央集权的统治。在思想上，他大力提倡儒家道统，以儒家思想的忠实继承者自居，力图以孔孟所宣扬的封建等级制度、伦理制度和道德、文化传统，挽救中唐政治危机。韩愈从卫道者的立场出发，反对佛教

和道教的社会虚无思想，对因果报应、长生不老等宗教迷信思想，深恶痛绝，严加驳斥，认为它是“伤风败俗，传笑四方”的欺骗伎俩，指出佛老之徒是一群不劳而获的寄生虫。客观上对维护国家统一，减轻人民负担，具有进步意义。在文学上，他全力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，反对六朝以来的骈文，以利于传播儒道，排斥佛老。他的文学理论首先强调文与道的统一，认为道是目的，文是手段；道是内容，文是形式，内容决定形式；同时承认形式对内容的重要作用：“辞不足不可以为文”，“文字暧昧，虽有美实，其谁观之？”其次，他提出了“唯陈言之务去”的著名论点，要求作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必须有所革新和创造，反对模仿抄袭，主张熔铸新词。文章语言要“与事相侔”，“因事陈词”，达到“文从字顺各识职”，合乎当时的语法规律。第三，韩愈很重视“文气”问题：“气盛，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。”认为文章词句的长短与声调的高低，即作品的气势、风格，决定于作家的“气”——精神力量和情绪状态；而“气”的获得又与作家的道德和文学修养密切相关。第四，韩愈还提出了“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”的论点，指出“不平则鸣”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，古今许多优秀作家的作品都是“不平则鸣”的产物。这就把文学创作与社会矛盾联系了起来，为文学批判现实提供了理论根据，突破了文学单纯为儒家道统服务的狭隘观念。

韩愈的作品现存《昌黎先生集》四十卷，《外集》十卷。散文的内容丰富，形式多样。他把先秦两汉的古文改造成为新型散文，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来，扩大了古文的表现功能。说理、记事、抒情、写人、状物，都很重视形象的鲜明生动和准确完整。文章的气势磅礴雄伟，自由奔放；感情曲折真挚，凄楚动人；语言明晰流畅，舒展自如，达到了“意无不达”的高度。他以当代

口语为基础，吸取古人语言的有益成份，创造出大量的新词汇，从而丰富了祖国的语言宝库。韩愈以他卓越的文学成就开创了一代新文风，把中国古典散文从僵死的骈文泥沼中拯救了出来，奠定了中世纪以来中国古典散文的雄厚基础，不愧为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文坛巨星。

原 毀

古之君子，其责己也重以周^①，其待人也轻以约^②。重以周，故不怠；轻以约，故人乐为善。闻古之人有舜者^③，其为人也，仁义人也，求其所以为舜者，责于己曰：“彼，人也，予，人也；彼能是，而我乃不能是。”早夜以思，去其不如舜者，就其如舜者。闻古之人有周公者^④，其为人也，多才与艺人也^⑤，求其所以为周公者，责于己曰：“彼，人也，予，人也；彼能是，而我乃不能是。”早夜以思，去其不如周公者，就其如周公者。舜，大圣人，后世无及焉；周公，大圣人，后世无及焉。是人也，乃曰：“不如舜，不如周公，吾之病也^⑥。”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！其于人也，曰：“彼人也，能有是，是足为良人矣；能善是，是足为艺人矣。”取其一不责其二^⑦，即其新不究其旧^⑧，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^⑨。一善，易修也；一艺，易能也。其于人也，乃曰：“能有是，是亦足矣。”曰：“能善是，是亦

足矣。”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！

今之君子则不然 其责人也详 其待己也廉^①。详 故人难于为善 廉 故自取也少。己未有善 曰：“我善是 是亦足矣。”己未有能 曰：“我能是 是亦足矣。”外以欺于人 内以欺于心 未少有得而止矣^②。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^③！其于人也 曰：“彼虽能是 其人不足称也 彼虽善是 其用不足称也^④。”举其一不计其十 究其旧不图其新 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^⑤。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！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^⑥，而以圣人望于人，吾未见其尊己也。

虽然，为是者，有本有原^⑦，怠与忌之谓也^⑧。怠者不能修^⑨，而忌者畏人修。吾常试之矣，尝试语于众曰：“某良士，某良士。”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^⑩；不然，则其所疏远，不与同其利者也；不然，则其畏也。不若是，强者必怒于言，懦者必怒于色矣。又尝语于众曰：“某非良士 某非良士。”其不应者 必其人之与也 不然 则其所疏远 不与同其利者也 不然 则其畏也。不若是 强者必说于言^⑪，懦者必说于色矣。是故事修而谤兴，德高而毁来。呜呼 士之处此世 而望名誉之光 道德之行 难已^⑫！

将有作于上者，得吾说而存之，其国家可几而理欤^⑬！

【题解】

本文以古之君子和今之君子在“贵己”、“待人”上的不同态度作对比，论证了当时社会形成“事修而谤兴，德高而毁来”不良

风气的根源，抒发了在这种风气下士人难以进身的不满情绪。文中善于排比，层层深入；运用对比，增强效果。唐代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。大贵族大地主把持朝政，他们的子弟可以凭借祖荫、门第轻易登上仕途；中小地主出身的士人，需要通过逐级考试审核，才有可能取得一官半职，他们的地位也不巩固，贬斥、罢官是常有的事。韩愈自己就有切身感受。因而他能深刻地揭露官僚权贵嫉贤妒能、压抑人材的腐朽现象，并对那些出身低微、仕途坎坷的士人寄予深切同情。

【注解】

重以周：重，严格；周，全面。以，连词，表示并列关系。

待：对待，要求。约：简单，很少。

舜：传说我国氏族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领袖，儒家所谓圣人之一。

乃：副词，竟然，却。

⑤周公：姓姬名旦，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，儒家所谓圣人之一。他是周文王之子，周武王之弟，周成王之叔，辅佐成王治理天下。

⑥艺：技艺。

⑦病：过失，缺点。

⑧取：采取，肯定。

⑨即：赞许。究：追究。

⑩恐恐然：害怕的样子。

⑪廉：很少。

⑫少：稍微。

⑬已：副词，表示程度，太，甚。

⑭用：作用，这里指本领，才能。

⑮闻（wèn）：名声，声誉。

⑯众人：多数的人，一般的人。

⑰有本有原：即有本原，有根源。

⑱总与忌之谓：代词“之”字复指前置宾语“总与忌”，如说“谓总与

忌”。

⑩修：学习，进取。

⑪与：党与，朋友。

⑫说：“悦”的通假，高兴。

⑬已：语气词，同“矣”。

⑭几(jī)：接近。理：治理，本应作“治”，唐人避高宗李治讳，多用“理”字代“治”。

【译文】

古代的士大夫，他们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，他们要求别人宽厚而简单。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，所以努力不懈；要求别人宽厚而简单，所以别人乐意做好事。听说古代有位舜帝，他的为人，是位讲仁爱守道义的人，探求舜帝为什么能成为这样的人，然后要求自己说：“他是个人，我也是个人；他能这样，可是我却不能这样。”早晨夜晚都在思索，去掉自己身上那些比舜帝差的地方，发扬那些跟舜帝一致的地方。听说古代有位周公，他的为人，是位多才多艺的人，探求为什么周公会成为这样的人，然后要求自己说：“他是个人，我也是个人；他能这样，可是我却不能这样。”早晨夜晚都在思索，去掉自己身上那些比周公差的地方，发扬那些跟周公一致的地方。舜帝，是伟大的圣人，后代没有赶上他的；周公，是伟大的圣人，后代没有赶上他的。这士大夫却说：“不如舜帝，不如周公，这是我的缺点。”这不是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吗？他对于别人，就说：“那个人能有这种长处，这就足够算个善良的人了；能擅长这个，这就足够算个有技艺的人了。”肯定别人的一种长处，不再苛求别人其它方面，赞许别人现在的进步，不去追究别人过去的毛病，担心害怕的只怕别人不能得到做好事的好处。一种美德，容易培养；一种技艺，